

高质量发展中数字普惠金融 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研究

张新月¹, 师博^{1,2}, 甄俊杰¹

(1.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2. 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 基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 从经济增长效率与分配公平两方面阐释了数字普惠金融所蕴含的信息技术属性和金融普惠属性对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理论逻辑, 进而采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共同富裕, 其中, 金融普惠属性相较于信息技术属性对推进共同富裕的效应更为明显。数字技术在资本整合类金融业务上的效果优于资本配置类, 借助数字技术优化资本配置将成为未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地理区位、经济发展、资本配置、金融机构分布和城市双创能力存在优势的城市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红利。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打破数字鸿沟、促进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的自我发展和良性融合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 数字普惠金融; 共同富裕; 效率与公平; 资本配置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92(2022)09-0047-12

DOI:10.13762/j.cnki.cjlc.2022.09.002

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 面临着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收入分配制度不尽完善、机会不均等挑战, 采取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改革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1][2]}。金融业具有优化资本配置、反映和监督经济运行的作用, 是要素流动的必要媒介、经济主体的重要链接以及市场信息的主要平台, 在国民经济中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 一个自由的金融市场能够自发地形成“涓滴效应”^[3]; 反之, 政府干预过度导致金融市场扭曲, 加剧收入不平等, 则会呈现出“倒挂效应”^[4]。金融业既渗透了实体经济活动, 又参与了社会收入分配, 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重要途径。

数字普惠金融是高质量发展转型阶段金融发展的新形态, 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谢康等(2021)从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中得出了效率与公平不完全相悖的结论^[5], 这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可以兼顾经济增长效率和分配公平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即考虑数字普惠金融信息数字化和金融普惠化融合所产生的综合效应。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出, 普惠金融应以“机会平等、惠及民生”为基本原则之一, 提升金融服务覆盖率、可得性与满意度, 增进社会公平。“数字普惠金融”一词则在此基础上引入了数字技术, 将基于互联网与数字化平台而进行的交易、转账、金融借贷、保险、证券等金融活动都纳入概念之中^{[6][7]}。数字普惠金融被赋予了新的数字化特征, 具有可获得性高、覆盖面广、交易服务成本低、服务效率高、信息透明度高特点, 成为现阶段突破普惠金融制约因素、打通融资约束“最后一公里”、实现“更有效率地普惠人民”的有效途径^{[8][9]}。但部分研究表明,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提升创

收稿日期: 2021-11-02

本刊网址: <http://cjlc.zufe.edu.cn>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FJLB026)

作者简介: 张新月(1996—), 女, 陕西咸阳人,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师博(1980—), 男, 河南原阳人,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通信作者; 甄俊杰(1998—), 男, 安徽合肥人,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

新效率的同时,也提高了数字鸿沟持续扩大的风险,这或许会导致新的贫富差距^{[10][11]}。

在对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效率和分配公平的关系讨论中,以往研究已经从数字鸿沟、居民消费、创新创业、减贫效应和利率市场化等不同视角进行了深入探讨^{[12][13][14][15][16]}。研究结果大多认可数字普惠金融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促进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方面的积极影响,但仍有学者认为马太效应未得到解决^{[17][18]}。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服务与精准服务的统一属性,恰恰使得数字普惠金融能兼顾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梳理了数字普惠金融所蕴含的信息技术属性和普惠属性对经济增长效率和分配公平的影响机制,并进行一系列实证检验。相比于以往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侧重分析总指标而忽略金融业务性质差异的研究特点,本文基于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内在要求,详细探讨了不同金融业务的数字化发展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能影响;探讨了不同区位特征、资本配置情况、金融机构分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创新创业能力的影响效果差异,分析和讨论了各类城市特征所面临的共同富裕困境;最后,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经济学研究中,效率和公平问题一直是学者们探讨的核心主题之一。以往研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集中反映了效率问题,而城乡收入差距能够反映社会分配的公平问题^{[19][20]}。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化信息技术与普惠金融业务相融合的产物,兼具信息化与普惠化双重特征,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增长效率与分配公平的影响也会受到二者的共同作用。

(一) 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属性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影响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对社会经济增长效率与分配公平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其内含的信息技术中。在微观视角下,金融科技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创新能力与风控能力等多个渠道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21]。以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加速,信息技术应用成为影响当代经济增长效率的重要因素^[19]。互联网的连通性特征缩短了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信息技术应用提升了金融机构与融资主体之间的沟通效率。创新主体通过线上融资平台拓宽信息的传播范围,提高了资本自由度。同时,借助资本流动带动创新的空间溢出效益,有利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各地区各层级的吸收、学习和交流,从而推动科技创新活动的区域一体化,强化城市内部创新热情和外部创新活力,进而推动城市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此外,信息技术应用打破了原有的市场壁垒,推动了资源广化配置和深化使用,从而加速信息共享,优化资源环境,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然而,对信息技术的潜在风险认识不足,盲目推进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会导致错误融合。错误融合不仅无法解决传统金融的制约问题,还降低了科技资源和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影响了信息技术在促进部门交互、推动资源高效流动和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上的贡献。

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效果难以一概而论。信息技术的应用将各部门在资源利用上的效率和成本真实地反映在公共信息平台上,促进市场发展,缓解资源和收入分配上的扭曲。然而,何宗樾等(2020)认为技术差异造成的数字鸿沟难以逾越,将扩大城乡贫富差距,带来更为严重的马太效应^[22]。另外,信息技术应用在与经济活动的融合过程中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良好融合可能有助于产业间互动,促进城乡一体化,优化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反之,错误融合也可能扩大城乡差距,加深二元经济结构,产生劳动市场和国民收入的极化效应^[23]。基于此,本文认为:

H1a: 信息技术有利于实现城市经济增长效率提升和分配公平,错误融合和数字鸿沟可能成为其中阻碍。

(二)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属性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影响分析

传统金融服务存在金融排斥问题,对提升社会经济增长效率和分配公平带来极大阻碍。普惠金融业务致力于为社会所有阶层提供切实可靠的金融服务,能显著克服传统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金融排斥问题,缩小“金融密度差异”,为农村提供更公平、更全面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聚焦于劳动技能、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农业价值创造等方面,提高低收入群体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能够有效地改善传统金融的结构性问题,缓解城乡收入不平衡。相比于传统金融业务,普惠金融涉及范围更广,缓解了农村小微经营与创业的信贷约束,增加了贫困农民收入。此外,普惠金融拓宽了保险业务和投资理财业务的覆盖范围,提高了城市经济的人均风险抵御能力,增强了农民对金融产品的使用意愿和能力,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增强农民收入增长能力,缓解城乡收入不平衡。但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仍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现有的普惠金融资源过度地向小企业、工薪阶层、富裕农户群体倾斜,不利于缓解城乡收入的不平衡,可能会加剧相对低收入群体的内部收入不平衡。有效解决普惠金融的结构性问题,打破传统金融业务的制约性瓶颈是普惠金融深化发展的一个关键^[8]。因此,本文认为:

H1b: 普惠金融中“普”的广度和“惠”的深度有利于实现城市经济增长效率提升和分配公平。

(三) 数字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影响分析

在数字金融的冲击下,传统金融行业开始了数字化转型,以维系和提升传统金融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内生增长理论分析框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是技术进步的外在表现,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路径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20]。从微观角度来看,金融领域的技术创新以及数字平台支持是实现传统金融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通过为客户提供创新性的平台服务、教育和培训,带来技术的进步^[24]。而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相结合的发展形态有效校正了传统金融中存在的属性错配、领域错配和阶段错配问题,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并驱动企业去杠杆、稳定财务状况,最终增加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25]。此外,通过促进家庭创业和就业以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是数字普惠金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另一微观机制^[26]。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低收入人群接受金融服务的门槛,通过“企业家孵化”机制刺激了劳动需求,为实现劳动者工资提升、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提供了可能。

经济增长的公平问题通常是结合城乡收入分配问题展开的,研究者们寄希望于借助信息技术和普惠金融服务来缓解传统金融的金融排斥问题,以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金融歧视与金融信息缺失是资源错配的重要原因,而金融资源错配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损失,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现代科技拓宽了金融信息获取渠道,扩大了金融信息共享范围,提高了金融信息准确性。通过对各个主体的历史金融行为和金融交易等相关数据的整合和深度处理,将各类“软”信息“硬”化^[27],作为金融资源识别与配置的重要依据。在普惠金融业务实践中,这不仅完善了传统金融机构的信用评估和风控系统,缓解了以往普惠金融业务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还弥补了小微信贷者的信息缺失,有效吸纳了小额闲置社会资本,促使金融市场向多元化结构转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逐渐缓解了金融资源配置扭曲,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推进共同富裕^[28]。因此,本文认为:

H2: 数字普惠金融兼具高效性与普惠性,有利于逐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

迄今为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仍未实现良性互动的双向促进关系,部分地区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并未处于相互契合的区间,导致数字普惠金融存在超前和滞后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情况^[25]。因此,在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共同富裕的机制时,我们不能忽视外部环境所带来的重大影响。首先,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数字化应用水平具有明显的区位特征,整体数字化水平呈现“东—中—西”阶梯式递减的特征^[9];其次,城市资本配置能力和金融机构的分

布情况也是直接影响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不同城市资本错配的“填补”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的异质性；最后，城市的创新创业活力直接关系到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广度与“惠”及深度，双创活力不同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效果可能存在异质性。本文认为：

H3：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共同富裕的效果取决于金融产品与数字技术的融合情况及各城市发展的现实环境。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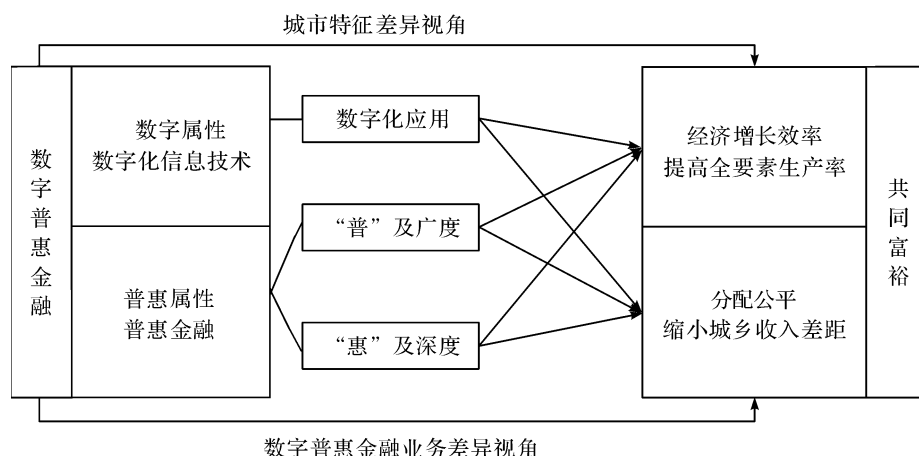


图 1 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框架

二、实证策略与数据

（一）实证分析策略

本文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刻画 2012—2018 年间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对效率和公平的影响：

$$Y_{it} = \alpha + \beta dif_{it-1} + \gamma \sum control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Y_{it} 为 i 城市第 t 年经济增长效率和分配公平的代理变量。借鉴以往研究，选取滞后一期的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dif_{it-1}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避免内生性问题^[25]。 $control_{it}$ 为控制变量， μ_i 代表城市固定效应， λ_t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与数据

1. 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共同富裕的外在表现：经济增长效率和分配公平。经济增长效率通过系统运作中的投入产出效率来衡量^[5]。目前主要有两种经济增长效率评价方法，一是全要素生产率，二是“投入—产出”法。分配公平主要标准是减少绝对贫困和收入不平等，尤其是城乡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29]。相比于增长核算法和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基于生产函数估算的 SFA 方法计算得出全要素生产率更能反映真实性^[30]，因此，本文选择用 SFA 法计算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比（IDG）分别度量经济增长效率和分配公平。所有回归模型均进行年份—城市双向固定，以避免本城市自身的被解释变量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干扰。

2. 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滞后一期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水平（Index），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集团所测算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表征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并分为数字普惠金融广度（Index_cov）、深度（Index_dep）和数字化程度（Index_dig）三个子指标。

3. 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PGDP），采用城市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度量；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Invest*) 采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比重衡量; 对外开放程度(*FDI*) 采用城市每年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占 GDP 比重度量; 政府干预(*Gov*) 使用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度量; 产业结构(*Ind*) 采用第三产业占城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 基础教育水平(*Edu*) 采用城市每万人中小学教师数取对数衡量; 人力资本水平(*Stu*) 采用城市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取对数衡量; 互联网基础设施(*Internet*) 采用城市每万人互联网用户数取对数衡量。

所有数据为 2012—2018 年中国内地 277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 均来自 CNRDS 数据库、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经济统计年鉴。对于缺失数据, 本文通过查阅各省市经济统计年鉴和插值法进行了填补。所有具有时间价值的变量均以 2002 年为基期进行了平减。实际利用外商投资使用汇率调整为人民币计价, 汇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TFP</i>	1939	0.243	0.151	-0.434	1.072
<i>IDG</i>	1939	2.396	0.486	1.296	4.353
<i>Index</i>	1939	4.936	0.510	2.834	5.713
<i>Index_cov</i>	1939	4.856	0.563	0.631	5.661
<i>Index_dep</i>	1939	4.920	0.515	1.456	5.785
<i>Index_dig</i>	1939	5.106	0.638	0.993	6.365
<i>PGDP</i>	1939	0.061	0.103	-0.498	2.982
<i>Invest</i>	1939	0.776	0.304	0.087	3.927
<i>FDI</i>	1939	0.018	0.027	0.000	0.355
<i>Gov</i>	1939	0.194	0.097	0.043	0.915
<i>Ind</i>	1939	45.087	11.560	0.000	98.000
<i>Edu</i>	1939	4.453	0.243	2.081	5.552
<i>Stu</i>	1939	5.786	0.951	-4.605	8.024
<i>Internet</i>	1939	7.465	0.643	5.331	9.701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数字普惠金融对推进共同富裕的影响检验

如表 2 所示, 数字普惠金融整体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以及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影响效果均在 1% 水平上显著,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逐步推进共同富裕, H2 得到了证实。此外, 滞后 2 期(*Index_2*) 和滞后 3 期(*Index_3*) 的回归结果表明,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动态叠加效果。

表 2 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共同富裕的基准回归与动态检验

变量	<i>TFP</i>	<i>IDG</i>	<i>TFP</i>	<i>TFP</i>	<i>TFP</i>	<i>IDG</i>	<i>IDG</i>	<i>IDG</i>
<i>Index</i>	0.048 *** (0.013)	-0.353 *** (0.042)	0.039 *** (0.014)			-0.308 *** (0.043)		
<i>Index_2</i>				0.069 *** (0.015)			-0.262 *** (0.040)	
<i>Index_3</i>					0.013 (0.015)			-0.149 *** (0.030)
截距项	0.062 (0.054)	3.955 *** (0.165)	0.027 (0.073)	-0.108 (0.082)	0.065 (0.087)	4.496 *** (0.220)	4.195 *** (0.207)	3.048 *** (0.165)
控制变量	NO	NO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城市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939	1939	1939	1662	1385	1939	1662	1385
R ²	0.058	0.408	0.067	0.081	0.022	0.434	0.328	0.172

注: 括号内是标准误; *、**、*** 分别代表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 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和普惠化对推进共同富裕的影响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兼具信息数字化和普惠化两大特征,数字普惠金融的具体实践体现在金融业务借助信息技术进行范围的扩张和使用的深化。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Index_dig$)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便利性、低成本和信用化角度进行衡量;数字普惠金融中“普”的广度($Index_cov$)表现在基于互联网的数字金融服务供给量,一般通过互联网电子账户数体现;而数字普惠金融中“惠”的深度($Index_dep$)表现在基于互联网的数字金融服务供给量,通过实际使用数字金融各项服务的总量和活跃度来衡量^[9]。

表 3 结果显示,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验证了数字鸿沟危害的存在,表明 H1a 中数字鸿沟所带来的危害超过了信息技术带来的红利。信息技术应用导致更严重的数字鸿沟,拉大城乡贫富差距,产生更为严重的马太效应。实证结果侧面印证了数字普惠金融中的数字化技术具有更强的劳动市场和国民收入极化效应,加深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23]。此外,普惠金融数字化技术的提升对城市经济增长效率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表明数字技术的自我提升并不能促进共同富裕,强调了 H1a 中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良性融合的重要性。

数字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均能显著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效率提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支持 H1b 的推测。事实上,数字金融广度和深度的提升仍能够反映数字化与普惠金融业务良性融合的重要性:依托信息技术的扩张,金融服务借助数字信息技术消除了传统金融排斥困境,更快速实现“乡乡有机构、村村有服务”的目标,提高金融服务与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逐步达到金融服务全覆盖;在此基础上,信息技术的深度使用提高了金融服务可得性,改善了城镇企业和居民金融服务的便利度。同时,借助数字化技术更快更准确地为城镇低收入人群、困难人群以及农村贫困人口、创业农民等金融边缘创业者提供金融支持,在微观层面刺激了城市内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主体的活力。通过数字普惠金融逐渐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借助现有技术深化普惠金融的广度与深度,而非一味地提高相关领域的数字化水平。

表 3 数字普惠金融分项指标对推进共同富裕的影响检验

变量	TFP	TFP	TFP	IDG	IDG	IDG
$Index_cov$	0.015 ** (0.007)			-0.222 *** (0.021)		
$Index_dep$		0.016 * (0.009)			-0.065 ** (0.032)	
$Index_dig$			-0.001 (0.005)			0.054 *** (0.015)
截距项	0.118 ** (0.059)	0.100 (0.065)	0.158 *** (0.059)	4.054 *** (0.174)	3.499 *** (0.198)	3.282 *** (0.18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城市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939	1939	1939	1939	1939	1939
R ²	0.065	0.064	0.062	0.454	0.417	0.422

(三) 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对推进共同富裕的影响效果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包含金融业务的基本特质和数字化技术带来的重大变化,即技术本身带来的效率提升及其对普惠金融业务的优化和强化效果。本文进一步将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分为支付、投资、信贷、货币基金、信用和保险六类。表 4 结果显示,保险和货币基金业务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支付、投资、信贷和信用业务无明显影响;支付、保险和投资业务显著提高了城市经济增长效率,货币基金和信用业务无明显影响,信贷业务甚至表现出抑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果。

首先,数字技术与保险业务的融合有助于提高特殊群体保险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削减保险服务的交易成本,增强参保意愿,扩大“普”的广度。此外,我国数字化保险表现为

对传统保险业务量和新型保险形式上的双重扩张，同时提升了“普”的广度和“惠”的深度，实现经济增长效率提升和分配公平两大目标。其次，支付业务借助数字技术提升了支付便利性，提高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有利于实现由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向消费拉动型增长方式的过渡，刺激经济活力，提高经济增长效率；而投资业务的优势则体现在借助数字技术达到对城市金融资源的充分吸收和有效配置上。货币基金业务发展仅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体现了信息技术对货币基金高安全性、高流动性、稳定收益性的“准储蓄”特征的强化作用，为拥有闲置小额资金的人群提供了低风险的创收途径。令人遗憾的是，信贷业务没有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促进作用，甚至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信贷业务主要以小微经营贷为主，具有门槛低、成本小的特点，本是刺激农村创业活力和创收能力、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但由于经营风险大、流动性强和缺乏自主创新等内在原因，小微经营活动通常无法长期存在并形成规模，难以通过产业集聚的方式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31]。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扶持小微企业的焦点应在于如何激励小微企业利用资金自我升级，逐渐从跟风模仿走向自主创新，而非一味降低小微经营贷门槛或提高资金量，以减弱城市资本的利用效率扭曲。最后，由于信用业务内容覆盖金融、住宿、出行和社交等领域，而各领域之间相互关联，故呈现出整体不显著的特征。

表4 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对推进共同富裕的影响检验

变量	TFP	TFP	TFP	TFP	TFP	TFP
支付业务	0.021 *** (0.005)					
保险业务		0.008 * (0.005)				
货币基金业务			0.002 (0.004)			
投资业务				0.034 *** (0.011)		
信贷业务					-0.007 ** (0.003)	
信用业务						0.009 (0.006)
截距项	0.082 (0.059)	0.134 *** (0.058)	0.103 (0.071)	-0.056 (0.104)	0.189 *** (0.058)	0.047 (0.14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个体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935	1938	1383	1108	1931	831
R ²	0.070	0.064	0.022	0.033	0.066	0.030
变量	IDG	IDG	IDG	IDG	IDG	IDG
支付业务	-0.002 (0.016)					
保险业务		-0.026 * (0.015)				
货币基金业务			-0.020 *** (0.008)			
投资业务				-0.012 (0.018)		
信贷业务					0.003 (0.010)	
信用业务						-0.010 (0.006)
截距项	3.480 *** (0.179)	3.555 *** (0.176)	2.594 *** (0.136)	2.319 *** (0.167)	3.467 *** (0.176)	2.376 *** (0.14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个体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935	1938	1383	1108	1931	831
R ²	0.417	0.417	0.162	0.153	0.416	0.119

四、进一步分析：城市特性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影响

(一) 区位异质下数字普惠金融对推进共同富裕的影响

表 5 结果显示, 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显著, 而中西部地区的作用效果则不明显。相比于中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数字化和信息化水平较高, 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先天的发展优势, 可以更好地激活城市创新效率, 进而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信息技术的发展虽然解决了金融排斥问题, 但数字鸿沟又将成为东部城市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阻碍。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公平发展, 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而且对西部地区的作用效果明显高于东中部地区。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了传统金融的金融排斥问题, 对于缩小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总体来看, 无论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均存在亟待改善的缺陷。

表 5 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共同富裕的异质性检验(地区)

变量	TFP			IDG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Index	0.070 *** (0.014)	-0.007 (0.029)	0.031 (0.029)	0.008 (0.084)	-0.143* (0.077)	-0.437 *** (0.071)
截距项	0.094 (0.071)	0.185 (0.142)	0.070 (0.148)	3.240 *** (0.428)	3.590 *** (0.375)	4.608 *** (0.36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城市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581	854	504	581	854	504
R ²	0.216	0.094	0.130	0.424	0.379	0.669

(二)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对推进共同富裕的影响

一般而言,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金融市场也越完善, 这必然会影响到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具体实施。本文采用夜间灯光数据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并将样本分为高灯光组与低灯光组进行回归分析。表 6 结果表明,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高灯光组) 具有较好的金融市场和创新优势, 信息技术与普惠金融的融合效果更好, 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且,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边际消费倾向也较高, 有助于实现消费拉动型增长。相比于经济增长效率, 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 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地区分配公平上并没有表现出较大差异, 两组样本依旧表现出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打破地理和市场壁垒, 依托数字技术提高普惠金融的广度与深度, 为欠发达的金融市场带来资本,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总体来看, 更高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有助于提升金融市场环境, 为逐步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条件。

表 6 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共同富裕的异质性检验(经济发展水平)

变量	TFP		IDG	
	高灯光	低灯光	高灯光	低灯光
Index	0.074 *** (0.011)	-0.003 (0.027)	-0.166 *** (0.058)	-0.251 *** (0.071)
截距项	-0.034 (0.060)	0.115 (0.128)	4.143 *** (0.309)	4.120 *** (0.33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城市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931	1008	931	1008
R ²	0.150	0.074	0.390	0.478

(三) 不同资本配置下数字普惠金融对推进共同富裕的影响

在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各项业务效果进行评估时, 我们发现支付、投资和货币基金业务均具有整合吸收闲置资本的特性, 而信贷业务则偏重于优化配置现有金融资源。一个地区的金融资源水平会

受到该地区金融业务结构的影响。通常,偏向整合与吸收类的业务结构会积累更多的金融资源。为度量地区金融资源配置状况,我们借鉴白俊红和刘宇英(2018)^[32]、赵志耘等(2006)^[33]的方法计算了各城市的资本错配指数,并根据该指数是否大于1将样本分为资本配置过度组和资本配置不足组。表7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资本配置不足地区和资本配置过度地区都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弥补资本缺口和再配置冗余资本解决资本扭曲问题,且资本配置过度地区得到的红利超过资本配置不足地区。这与之前的实证结果相互佐证:除支付业务外,以货币基金和投资业务为代表的资本整合类金融服务是现今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人民共同富裕的主要形式。虽然数字普惠金融的保险业务发展在整体上弥补了信贷业务的扭曲效应,但数字技术与信贷业务融合难的问题仍待解决。可以预见,未来金融资金池的扩张并非难题,如何依托数字信息技术发挥小微企业信贷政策的作用,才是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

表7 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共同富裕的异质性检验(资本配置水平)

变量	TFP		IDG	
	资本配置不足	资本配置过度	资本配置不足	资本配置过度
<i>Index</i>	0.042 ** (0.017)	0.045 * (0.025)	-0.283 *** (-0.068)	-0.307 *** (-0.060)
截距项	0.033 (0.084)	0.024 (0.133)	0.046 (-0.338)	-0.098 (-0.33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城市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112	827	1112	827
R ²	0.068	0.154	0.423	0.400

(四) 不同融资渠道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对推进共同富裕的影响

由于本文使用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观测样本以中小微企业为主,地方中小型金融机构是该类企业融资的重要媒介,故融资渠道的多样性将直接影响资本流向企业的难易程度。本文利用python爬取了中国银保监会网站公布的金融许可证信息上的全部金融机构名单,最终得到各城市剔除4大国有银行和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后的其他金融机构的历年累积个数,并按照年均值将样本分为融资渠道单一组和融资渠道多样组。表8结果显示,相比于融资渠道多样地区,在融资渠道单一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更大,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业务是对传统金融的有效补充。借助数字化的保险和货币基金业务降低生活和经营风险,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居民带来了新的收入来源。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只有在融资渠道多样的地区才会显现,表明中国金融结构改革需要大力发展各类金融机构,藉此形成与实体经济结构相匹配的最优金融结构,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表8 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共同富裕的异质性检验(融资渠道水平)

变量	TFP		IDG	
	融资渠道多样	融资渠道单一	融资渠道多样	融资渠道单一
<i>Index</i>	0.054 *** (0.013)	0.032 (0.022)	-0.170 *** (0.065)	-0.369 *** (0.058)
截距项	0.058 (0.068)	-0.017 (0.109)	4.045 *** (0.344)	4.823 *** (0.29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城市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723	1216	723	1216
R ²	0.125	0.070	0.462	0.427

(五) 不同创新创业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对推进共同富裕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偏向服务那些过去受到金融歧视的农村人群,借此提高农村的创业活力与创收能力。此外,创新创业能力强的城市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得到更多创新资本,提高城市创新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据此,本文利用 2020 年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分析中心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的年均值得分将样本分为城市双创水平高和城市双创水平低两组进行回归。表 9 结果显示,双创水平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仅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双创水平高地区则提高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从金融服务类型来看,双创水平低地区主要受益于保险类金融业务;而双创水平高地区则能借助投资和支付类金融业务,创造多元化消费需求、带动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提升与分配公平。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活力与能力,是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共同富裕的另一关键。以上异质性分析结果证实了 H3。

表 9 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共同富裕的异质性检验(城市双创水平)

变量	TFP		IDG	
	城市双创水平高	城市双创水平低	城市双创水平高	城市双创水平低
<i>Index</i>	0.064 *** (0.012)	0.000 (0.033)	-0.272 *** (0.061)	-0.317 *** (0.076)
截距项	0.017 (0.064)	0.103 (0.158)	4.521 *** (0.315)	4.363 *** (0.36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城市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187	752	1187	752
R ²	0.128	0.073	0.435	0.449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从经济增长效率与分配公平两方面阐释了数字普惠金融所蕴含的信息技术属性和金融普惠属性对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理论逻辑,并以中国内地 277 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推动共同富裕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经济增长效率和分配公平,但数字化程度会通过加剧数字鸿沟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技术在资本整合类金融业务上的效果优于资本配置类金融业务,如何利用数字技术优化资本配置是未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资源配置状况、融资渠道情况和城市双创能力是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外在因素,维持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逐步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石。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结构。加强小微金融机构的布局与试点工作,拓宽普惠金融普及的广度。利用互联网等数字化手段促进普惠金融惠及广大农村地区,提高农村地区创新创业活力。第二,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提高农村地区数字化应用水平,化数字鸿沟为“数字机遇”。第三,正确认识不同金融业务的作用,积极完善相关政策,防范化解数字普惠金融风险的发生。本文证实,并非所有数字普惠金融业务都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效率与分配公平,相关部门应进一步细化针对不同金融业务的政策规定,严防数字普惠金融借力信息技术“脱实向虚”。第四,不同地区在制定金融政策时,应考虑可能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挥效用的异质性因素,做到因企施政、因地施策,最大限度利用好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 [1] 张来明, 李建伟. 促进共同富裕的内涵、战略目标与政策措施 [J]. 改革, 2021, (9): 16-33.
- [2] 洪银兴. 以包容效率与公平的改革促进共同富裕 [J]. 经济学家, 2022, (2): 5-15.
- [3] Aghion P., Bolton P. A Theory of Trickle-Dow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7, (2): 151-172.
- [4] 陈斌开, 林毅夫. 金融抑制、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 [J]. 世界经济, 2012, (1): 3-23.
- [5] 谢康, 廖雪华, 肖静华. 效率与公平不完全相悖: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视角 [J]. 经济研究, 2021, (2): 190-205.
- [6] 黄益平, 黄卓. 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 现在与未来 [J]. 经济学(季刊), 2018, (4): 1489-1502.
- [7] 黄漫宇, 曾凡惠.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J]. 软科学, 2021, (2): 14-18, 25.
- [8] 焦瑾璞. 普惠金融导论 [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9.
- [9] 郭峰, 王靖一, 王芳, 等. 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 [J]. 经济学(季刊), 2020, (4): 1401-1418.
- [10] 蒋仁爱, 李冬梅, 温军. 互联网发展水平对城市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J]. 当代经济科学, 2021, (4): 77-89.
- [11] 张勋, 万广华, 吴海涛. 缩小数字鸿沟: 中国特色数字金融发展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 (8): 35-51, 204-205.
- [12] 易行健, 周利.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J]. 金融研究, 2018, (11): 47-67.
- [13] 张勋, 万广华, 张佳佳, 等.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 [J]. 经济研究, 2019, (8): 71-86.
- [14] 万佳璇, 周勤, 肖义. 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J]. 经济评论, 2020, (1): 71-83.
- [15] 刘锦怡, 刘纯阳. 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 效果与机制 [J]. 财经论丛, 2020, (1): 43-53.
- [16] 邱晗, 黄益平, 纪洋. 金融科技对传统银行行为的影响——基于互联网理财的视角 [J]. 金融研究, 2018, (11): 17-29.
- [17] 陈晓洁, 何广文, 陈洋. 数字鸿沟与农户数字信贷行为——基于 2019 年欠发达地区农村普惠金融调查数据 [J]. 财经论丛, 2022, (1): 46-56.
- [18] 王修华, 赵亚雄. 数字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马太效应? ——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经验比较 [J]. 金融研究, 2020, (7): 114-133.
- [19] Georg G., Michaels G. Is Modern Technology Responsible for Jobless Recoveri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5): 168-173.
- [20] Arizala F., Cavallo E., Galindo A.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TFP Growth: Cross-Country and Industry-Level Evidence [J]. Applied Financial Economics, 2013, (6): 433-448.
- [21] 薛莹, 胡坚. 金融科技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理论逻辑、实践基础与路径选择 [J]. 改革, 2020, (3): 53-62.
- [22] 何宗樾, 张勋, 万广华. 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多维贫困 [J]. 统计研究, 2020, (10): 79-89.
- [23] 王永钦, 董雯. 机器人的兴起如何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 ——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J]. 经济研究, 2020, (10): 159-175.
- [24] Haddad C., Hornuf L. The Emergence of the Global Fintech Market: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terminants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9, (1): 81-105.
- [25] 唐松, 伍旭川, 祝佳. 数字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结构特征、机制识别与金融监管下的效应差异 [J]. 管理世界, 2020, (5): 52-66, 9.
- [26] 王永仓, 温涛, 王小华.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影响效应与传导机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J]. 财经论丛, 2021, (9): 37-48.
- [27] 盛天翔, 朱政廷, 李祎雯. 金融科技与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 基于贷款技术视角 [J]. 管理科学, 2020, (6): 30-40.
- [28] 张子豪, 谭燕芝.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8, (6): 1-7.
- [29] 李建军, 李俊成. 普惠金融与创业 “授人以鱼” 还是 “授人以渔”? [J]. 金融研究, 2020, (1): 69-87.
- [30] 余泳泽, 张先彬. 要素禀赋、适宜性创新模式选择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J]. 管理世界, 2015, (9): 13-31, 187.
- [31] 盛丹, 王永进. 产业集聚、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与企业的融资成本——来自世界银行调查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证据 [J]. 管理世界, 2013, (6): 85-98.
- [32] 白俊红, 刘宇英.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改善中国的资源错配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 (1): 60-78.
- [33] 赵志耘, 刘晓路, 吕冰洋. 中国要素产出弹性估计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6, (6): 5-11.

A Study on Mechanism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for Common Prosperity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ZHANG Xinyue¹, SHI Bo^{1 2}, ZHEN Junjie¹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2.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a We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How to balanc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efficiency and social equity is the key to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

economic development , rural revitalization , and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inherent needs of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logic about how the technical attributes of information and inclusive attributes of finance contained i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romote and realize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istributio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 and then selects 277 regions in China as research samples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test with the help of the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from Peking University. It demonstrate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promoting the achieve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ttribute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attribut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The empirical study makes a horizontal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tiated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business on promoting the achieve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the breadth , depth and digitalization degre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Finally ,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above effects is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ities.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of all , the breadth of "universal" and the depth of "benefit" i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economy and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y breaking the financial exclusion of tradi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However , the deepening of digitalization has led to a larger digital divide and widened the income gap ,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good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nclusive finance. Secondly , through the cross-sec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six major businesse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gration effe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capital integration financial business is better than that in capital allocation financial business , which indicates that optimizing capital allocation with the help of digital technology will become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the future. Thirdly ,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cities creat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n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equ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on finance. The locations of different cities allow the eastern region to receive more economic efficiency dividends and narrow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Similarly ,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shows stronger positive effects in cities with higher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can address capital distortions by both bridging capital gaps and reallocating redundant capital , and over-allocated areas receive far more dividends than under-allocated areas. The empirical results on SMEs' access to finance show tha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business improves rural income and reduces the urban-rural gap by complementing the business scope of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 but its effect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effective only in areas with diverse access to finance. Finally , having a strong capacity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s another key for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 , improving the level of digital applications in rural areas , properly understanding and improving inclusive financial services , and maintaining a favorable financial environment are important cornerstones for graduall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ommon Prosperity; Efficiency and Equity; Capital Allocation

(责任编辑: 原 蕴)